

论《诗薮》对《日本诗史》的影响

胡 欣 严 明

摘 要: 日本江户中期江村北海的《日本诗史》深受明代胡应麟《诗薮》的影响。形式上,在继承《诗薮》以诗话体记载诗史的基础上,《日本诗史》又融入史传的体例。内容上,江村北海发展了胡应麟“气运”说,提出了“世道”说,并指出“气运”是日本汉诗承接中土传统并另辟蹊径的根本原因,而“世道”则是日本汉诗得以独具本国特色的基因土壤。在诗歌审美方面,江村北海将胡应麟“格调声律、兴象风神”与本国“哀”审美观念融于一体,提出了格律声调、风雅并重的评诗标准。可以说,《诗薮》为江村北海撰写《日本诗史》提供了诗学基础及写作范式。

关键词: 《诗薮》; 《日本诗史》; “气运”说; 比较汉诗学; 诗歌审美

作者简介: 胡欣,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电子邮箱: huxinziyue@126.com

严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及东亚汉诗学研究。电子邮箱: 18918824460@163.com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规划项目“东亚汉诗史初稿”[项目编号: 14AZW007]、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东亚汉诗学新论”[项目编号: 2013BWY005]中期成果。

Title: The Influence of Hu Yinglin's *Shi Sou* on Emura Hōkai's *History of Japanese Poetry*

Abstract: Whe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Poetry*, the Mid-Edo Japanese scholar Emura Hōkai (1707-1782)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Shi Sou* (*An Anthology of Poetry*) compiled by Chinese Ming-Dynasty scholar Hu Yinglin's (1551-1602). In compiling method, Emura's *History of Japanese Poetry* was written in the way that integrated narration of history through poetry commentaries with biographical history. In thematic treatment, Emura developed Hu's concept of “*qi yun*” (spirit-mores) and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shi dao*” (generation-way), claiming that Hu's concept of “*qi yun*” was inherited by the Japanese and became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Japanese to develop its own poetics that grounded in “*shi dao*”. In terms of poetic aesthetics, Emura integrated Hu's idea that tonal pattern and rhyme scheme represent the spirit with Japanese aesthetic concept of “*aware* (哀れ)” and proposed his criteria of poetic criticism. In conclusion, Hu Yinglin's *Shi Sou* provided a norm for Emura Hōkai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Poetry*.

Keywords: *Shi Sou* (*An Anthology of Poetry*);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Poetry*; the concept of “*qi yun* (spirit-mores)”; comparative Chinese poetics; poetic aesthetics

Authors: **Hu Xin** is a Ph. D. student in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with research focus o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huxinziyue@126.com

Yan Ming is a professor in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ing literatur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East Asian Chinese poetry studies. Email: 18918824460@163.com

江户中期的明和八年(1771年),诞生了日本第一部具有诗史性质的诗话著作——江村北海的

《日本诗史》。该书撰作“以华人为法”(池田四郎次郎 133),受到中国诗话著作的影响,其中,江村

北海在《授业编》中称其受明代胡应麟《诗薮》的影响最大(清水茂等 603)。本文主要从诗学论著的体例结构、“气运”说、诗歌审美标准三个方面,探讨《诗薮》对《日本诗史》的重要影响,借以辨析江户时代中日汉诗学观念的交汇及新变。

一、《诗薮》影响《日本诗史》的背景

(一)《诗薮》的日本流传

明代胡应麟(1551年-1602年)的《诗薮》于1590年(明万历十八年)刊行,大约于江户初期传入日本。贞享三年(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已有和刻本(刘芳亮 54),明和元年(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又进一步进行了修刊(刘芳亮 105)。“及元禄之际,锦里先生者出,始唱唐诗,风靡一世。然其所奉书,仅止于《沧浪诗话》、《品汇》、《正声》、沧溟伪《唐诗选》、胡氏《诗薮》而已。而出其门者,白石、鸠巢之徒,各木铎于东西,而扩其恶风于四方,虽徂徠、南郭之徒,相继而出,皆悉中其毒。不得复其迷,诗道渐衰矣”(池田四郎次郎 519)。锦里先生(木下顺庵,1621年-1698年)及其门下新井白石、室鸠巢等汉诗人,皆以唐诗为尊。后荻生徂徠及门下服部南郭、高野兰亭等蕅园弟子,更进一步倡导唐诗,推崇严羽《沧浪诗话》、胡应麟《诗薮》等持有尊唐贬宋诗学观的诗话。在木门及徂徠“蕅园派”的大力推介下,胡应麟《诗薮》在日本汉诗界被广泛引用,如林东溟《诸体诗则》(池田四郎次郎 319)、原田东岳《诗学新论》(池田四郎次郎 299)、芥川丹丘《丹丘诗话》(池田四郎次郎 619)等,皆奉其为诗作圭臬,影响极大。《诗薮》在日本的广为流传,为江村北海借鉴其诗学观,进而为编撰日本汉诗史提供了重要的诗学理论资源。

(二)江村北海的汉诗渊源

江村北海(1707年-1782年),名绶,字君锡,号北海,通称左卫门,福井藩儒者伊藤龙洲的次子,丹后官津藩儒官江村毅庵养子。少年时期沉溺俚歌俗曲,并不用心汉籍儒学。在一次俳谐聚会上,明石藩儒梁田蛭岩(1672年-1757年)却赞赏北海,鼓励他在汉诗创作方面发挥才华(清水茂等 598)。北海由此受到激励,师从梁田蛭岩三年,发奋苦读,修习儒业。二十二岁时,代父伊藤龙洲教习子弟,讲说汉籍经史。享保十九年

(1734年),养父江村毅庵去世,北海继承其位,成为丹后青山家儒师。后又出仕官津、京都,游历渐广,在汉诗写作方面由于师从梁田蛭岩的缘故而秉承木门传统。“国初以来,诗宗宋元,至先生(木下顺庵),断然唱唐诗,英杰之士,四方来归焉,如白石、沧浪、芳州、霞沼、南海、蛭岩,皆出于其门”(池田四郎次郎 513)。木门一派倡导唐诗,推崇《沧浪诗话》及《诗薮》,这对江村北海无疑有着很大的影响。

北海于宝历十三年(1763年)五十一岁时卸任致仕,在京都室町新筑树梢馆,授徒讲学,平日以翰墨自娱,沉浸于汉诗文。每月十三日,召集多名士及门人在其赐杖堂唱酬赋诗,时称“赐杖堂诗盟会”,这使得北海的诗名远扬。赋闲之后的江村北海迎来了汉诗创作丰收的时期,持续的诗会酬唱,全身心地投入诗作,这些经历使得北海不断加深对汉诗学的理解,也为他编写《日本诗史》提供了厚实的基础。明和四年(1767年),初次刊行《北海先生诗钞》。明和三年(1766年)秋开始编写《日本诗史》,明和五年(1768年)完成初稿,到明和八年(1771年)定稿刊行。此外,他还有《日本诗选》正续十八卷,《授业编》十卷等。

总之,江村北海师从梁田蛭岩,其诗学观及汉诗创作深受木门(木下顺庵)一派影响。木门一派最重唐诗,也推重胡应麟鼓吹唐诗的《诗薮》,而且江村北海在《授业编》中自称受明代胡应麟《诗薮》的影响最大(清水茂等 603),十分熟悉《诗薮》的内容和形式。北海致仕后在京都开馆授徒,在教学过程中对汉诗学追根溯源,进而想编写一部类似于《诗薮》的日本诗史教材,这或许也是其编写《日本诗史》的起因之一。

(三)江户诗坛风气新变

中国历代诗歌是日本汉诗长期借鉴和创新发展的源泉。中国诗歌的新变潮流,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也会相应地显现于日本诗坛。

胡应麟与江村北海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度和时代,但他们身处的诗坛风气却有几分相似。明代中叶,诗坛派别林立。胡应麟入白榆社,诗社成员之间经常谈论诗歌流变,这使胡应麟对当时仍占诗坛主流的复古派诗风之弊端有了清醒的认识。他撰写《诗薮》的目的,主要是对前后七子诗学观进行理论总结,并对当时一味模拟、缺乏独创的复古派诗作进行批判。

江村北海身处江户中期,诗坛盛行格调派风气,“其中如赐杖堂、长啸社、幽兰社、混沌社等诗社,与当时市井生活的繁华、酒撰的丰盛、诗会谈论的关系密切”(孙立13)。在此背景下,“汉文学的作者反省格调派的失误”(孙立13),江村北海不满复古派诗歌创作过于模拟唐、明诗,指出当时汉诗人唯复古为尊,不辨真伪之弊,“以荻生徂徕为首的謏园派诗人以复古论席卷整个诗坛,致使一些人没有诗才而假借复古派得以出名,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却被埋没”(清水茂等601)。江村北海针对徂徕“古文辞”派的流弊,呼吁纠正诗坛盲目复古、空疏不学的风气,以求去伪存真,回复汉诗创作的正确轨道。

胡应麟生活的明万历(1573年-1619年)年间与江村北海生活的江户中期,都出现了对流行诗坛的复古诗风进行批判的强烈呼声。两位诗人对复古派诗歌的创作之弊都有深刻的认识,也都在呼唤诗坛新风。这种相似的诗坛风气以及诗学观念,使得江村北海对胡应麟《诗薮》产生强烈共鸣,并借鉴其视角观念考察日本汉诗发展途径,进而促进了《日本诗史》的诞生。

二、《诗薮》的体例结构对《日本诗史》的影响

《日本诗史》受《诗薮》影响颇大,尤在体例方面(清水茂等603),即利用诗话体概述诗歌史。《诗薮》共20卷,全书分为四编,其中内编六卷,以体为纲,分论古体杂言、五言、七言、近体五言、七言、绝句;外编六卷,以时代为序,评周、汉、六朝、唐、宋、元诗;杂编六卷,谈三国、五代、南宋、金诗及亡佚篇章、载籍;续编二卷,论明洪武至嘉靖年间诗。内编是分体诗歌史,外编是诗歌流变史,形成了纵横交错、经纬交织的诗史叙述体系。

《日本诗史》共五卷,卷一、卷二始自白凤时代(673年-685年),迄于江户初的庆长末(1614年),叙天皇、朝廷大臣、贵族、武士、医生、隐士、僧侣、闺秀之诗;卷三、卷四、卷五分别论述元和(1615年-1623年)以后至宝历(1751年-1763年)年间京都、江户及日本各州诗人。全书以时代为序,地域为别,按诗人身份地位分类,纵横统摄,自成一统,简要叙述了日本自白凤至江户时代的汉诗历史。

《诗薮》内编以诗体为别,每种诗体按时代顺序加以简述;外编则概述历代诗歌衍变历程,由此对历代诗歌的源流正变以及体制发展进行了整体建构。江村北海同样追溯日本汉诗发展史,认为日本汉诗承顺“中土”发展而来,并辨析了古体诗与近体诗之优劣,“是编所论载诗,大率近体,绝不及古诗者。中古朝绅咏言,近体间有可录,至古诗殊失其旨。元和(1615年-1623年)以后,作者辈出,近体诗实欲追布中土作者,但五言古诗未得其面目”(清水茂等471)。认为江户诗人近体诗优于古体诗,江户古体诗大都是一些肤浅模拟之作,未得汉诗真髓。因此,北海所论述的日本诗史,基本上只论述白凤时代至江户中期宝历年间近体诗的衍变历程,并对各个时期的诗人诗作进行了鉴赏品评。

胡应麟的《诗薮》是一部具有诗歌史性质的诗话著作,为江村北海的诗史写作提供了写作形式与方法,使步其后尘的《日本诗史》初步有了“汉诗史”的概述形式。江村北海仿《诗薮》内外编写方式,分别概述了日本汉诗的发展历程,成就了第一部概述日本汉诗史的诗话著作。日本汉学界都将《日本诗史》归入诗话著作,如池田四郎次郎编纂的《日本诗话丛书》,清水茂、揖斐高、大谷雅夫校注《日本诗史·五山堂诗话》等。

应该看到,《日本诗史》借鉴了《诗薮》的诗史写作方法,但是其撰写并未囿于《诗薮》的结构体系,而是基于日本汉诗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创新。“日本文学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向心倾向。几乎所有的作者都居住在大城市,读者也同样都是大城市的居民”(加藤周一11)。京都、大阪、东京自古以来就是文人聚居之地,文学兴盛之地,亦是汉诗活动昌盛之处。另外,日本文学具有超政治性,其“没有科举制度,文人难以参政,文学创作队伍不像中国以文人士大夫、即官僚知识分子为主体,而主要是由僧侣、儒者、女性组成”(蔡毅169)。江村北海采取以“京师、东都、他州”的地域划分为主,又按照“天皇、武士、医生、隐士、僧侣、闺秀”的身份地位分类加以补充叙述,这样的分类法是符合日本汉诗发展实际情况的。

这种以“地域划分为主”、“按照身份地位分类叙述”的方式,可以看出江村北海将中国传统的史撰国别体、纪传体的体例运用于《日本诗史》

的编撰中。国别体按国家(诸侯国)分类记载历史,如《国语》。纪传体是以为人物作传记的方式概述历史,如《史记》。随着中国史籍在东亚各国的广泛流传,国别体、纪传体成为东亚各国史传编撰中的常用体例。江村北海采用史传体例编写,使其《日本诗史》不仅记录当时京都、江户等中心城市汉诗创作及流派发展的情况,而且也记录了如越前、长崎、肥后、萨摩州、备前等其他州县的汉诗创作情况,堪称完备。这种史传叙事方式的使用,是《日本诗史》在借鉴《诗薮》体例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其成功的运用又成为《日本诗史》体例上有别于《诗薮》的一大特色。

三、《诗薮》“气运说”对《日本诗史》的影响

江村北海在撰写《日本诗史》时,借鉴了《诗薮》中的“气运”概念(清水茂等 603),用以总括日本汉诗衍变的深层原因,这在日本汉诗学史上是第一次。“气运”一词在《诗薮》中频繁出现,如“文章非末技也,权侔警跸,功配生成,气运视以盛衰,尘劫同其悠远”(胡应麟 2)。“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形容景物,妙绝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斩然。故知文章关气运,非人力”(胡应麟 59)等。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61),关注文学兴废与世情时序之间的制约关系,成为中国诗学研究的重要传统范畴之一。胡应麟所言“气运”说,延续前人视角,重视社会时代等外在因素对诗歌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力,认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会促使一个时期的诗体诗风发生转变,这种转变非关人力,不可抗拒,“气运”于是成为诗歌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胡氏“气运”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如当时许学夷(1563年-1633年)的“风气”说、明末清初钱谦益(1582年-1664年)的“世运”说、清末黄遵宪(1848年-1905年)的“时势”说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胡氏“气运”说的影响。清康熙年间吴中顾嗣立(1665年-1722年)编撰《元诗选》时,其编撰理念中同样贯穿着“气运”说的影响。“顾子选元诗凡百家,刻成,以序请予,乃为之序

曰:盈天地间皆以气运也,而气之神而善变者莫如风”(顾嗣立 序 5)。总之,强调“气运”的作用标志着胡应麟对诗歌衍变规律的自觉探索,在明清诗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在北海《日本诗史》问世之前,胡应麟《诗薮》就已传入日本,其“气运”说也在日本诗话中被屡次提及。如《丹丘诗话》:“诗者[……]夫天地之大,莫不有焉,腐宋胡元,亦气运之偏至,皆不外于元声也”(池田四郎次郎 553)。《诗学新论》:“文章之道,与气运盛衰”(池田四郎次郎 295)。《诸体诗则》中林义卿“以与代相变者”而论诗“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池田四郎次郎 187)。从上面引文中可以看出,江村北海之前的日本诗话中引用“气运”说,往往是论述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尚未将审视目光转向日本汉诗的气运变化。而北海撰写《日本诗史》,则不仅自觉以“气运”说探寻日本汉诗发展规律,而且对胡氏“气运”说进行了深入阐释,并结合日本汉诗史的实际状况而有所创新发展。

据笔者统计,江村北海在《日本诗史》中至少有 12 次明确提到“气运”,^①其所言“气运”涵义丰富,要旨如下:

(一)“气运”递迁是日本汉诗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中日汉诗出现时间差的根本原因。“夫诗,汉土声音也,我邦人不学诗则已,苟学之也,不能不承顺汉土也。而诗体每随气运递迁,所谓《三百篇》、汉魏六朝、唐宋元明,自今观之,秩然相别,而当时作者则不知其然而然者,气运使之者,非耶?我邦与汉土相距万里,划以大海,是以气运每衰于彼而后盛于此者,亦势所不免。其后于彼,大抵二百年,胡知其然?”(清水茂等 508)。江村北海对日本汉诗的发展溯源探索,认为汉诗发源于中国,又在日本得到承续发展,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一种作者不知其然的“气运”。

日本汉诗的发展相对中国而言,表现出了一种似乎有规律的滞后期,大约滞后二百年,这一观点为江村北海首次提出并对日本汉诗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清水茂等 603)。日本汉诗发展“二百年”滞后说,是江村北海对日本汉诗发展史与中国历代诗歌进行整体比较之后得出的合理推论,如《怀风》、《凌云》二集所收日本汉诗学中国齐梁诗风,五山诗僧学宋元,元禄汉诗人学明前后七子

等,各时代皆如此。更重要的是,江村北海在此基础上还指出,出现“二百年”时代差的根本原因是中日汉诗“气运”转换所致。北海所说的“气运”转换,一方面是指中日两国相距遥远诗风传递有时间差,在中国盛极而衰的诗风往往在日本还处于兴盛期;另一方面是指中国诗风传入后,被日本诗人接受和改造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差。总之,江村北海所言“二百年”乃是中日汉诗气运转换的时间差,而这一段时间差,正是日本汉诗接受中国诗风后,学习消化并将中国汉诗本土化所需的时间。

(二) 气运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诗人的意志为转移。北海认为“有先于徂徠已称扬七子者”,《活所备忘录》曰:李沧溟著《唐诗选》甚契余意,学诗者舍之何适。又曰:谢茂秦《洞庭湖》,徐子与、吴明卿《岳阳楼》作,气象雄壮,与绝景相敌,殆可追步少陵、浩然二氏。永田善斋《脍余杂录》亦论及七子,而尔时运未熟,故唱之,而无和者。迄徂徠时,其机已熟,白石、沧浪、蜕岩、南海大抵与徂徠同时,并非贾夔园之余勇者,而其诗虽曰宗唐,亦唯明诗声格。故云:气运使之也”(清水茂等 508)。江户前期诗坛的那波活所与永田善斋,虽然早已提倡明七子之诗,但当时气运未至,终未被诗坛所接受。这一段分析,与胡应麟《诗薮》中论述宋元诸子有志于复古而未成功的原因相同,皆认为当时诗坛“气运未开”。而当日本诗坛复古学唐的气运形成之后,荻生徂徠、新井白石、室鸠巢、梁田蜕岩、祇园南海等人学明七子的风气就顿成浩大之势,席卷整个日本诗坛。可见气运的影响力之大,其主宰着江户诗风的转变和诗坛的兴衰。

从这一视角出发,江村北海对日本汉诗发展历程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比如认为江户前期诗坛风气转变及出现复古潮流,与中日汉诗气运转换密切相关“以余观之,清人篇咏,大抵诸家相似,其缜整雅柔,颇似于元季明初作家。较诸近时所谓明诗者,无剽窃雷同之病,而其气格则稍淡薄矣。当今京摄才髦所作,往往出于此途,亦气运所鼓,不得不然”(清水茂等 508-09)。北海将中日汉诗放在同一平台进行比较,指出江户诗坛由推重明诗到仿学清诗的风气转变,是气运的不可逆性所致。同时他还指出江户时期复古派诗作中出现的剽窃雷同

流弊也是受气运所致,并且对此流弊多有批评,如评新井白石《送人之长安》“红亭绿酒画桥西,柳色青青送马蹄。君到长安花自老,青山一路杜鹃啼”,“四句中,二句全用唐诗。夫剽窃,诗律所戒,而炼丹成金犹可言也,以铅刀代镢,将之何谓?‘草色青青送马蹄’,本临歧妙语。草色送马蹄,言春草承马蹄,以柳代草,蹄字无着落,殊为减价”(清水茂等 503)。在尊唐学明盛行的风气中,似这样明显的模仿之作还有很多。随着气运的推移,诗坛风向转变后,诗作的评判标准也会出现颠覆性的转变,因此,带来日本汉诗创作的推陈出新和不断发展。

(三) 诗运盛衰关乎世道污隆。除了“承顺汉土”的因素之外,日本诗坛风气变化还受到本国世道变化的深刻影响。江村北海指出,“文学盛衰有关乎世道污隆[……]应神天皇登极[……]于是我邦始有六经云。仁德天皇为皇子时[……]是以海内又安[……]胡厥盛哉。自时厥后,列圣相成,文教日阐[……]汪洋于弘仁、天历间,可谓帝业与文学偕盛也。延久已降,朝纲解纽,文事日废[……]战争无已,生民涂炭[……]艺苑事业,无复子遗矣。[……]若夫神祖圣文神武[……]命惺窝先生,讲析经史之义[……]土业日广,至今百六十年,玉烛继光,金瓯无亏,风化之美[……]而近时文华之郁,无让汉土,今论列其一二,未遑屡举云”(清水茂等 490)。列代天皇都提倡汉学,汉诗文创作日渐兴盛。到弘仁(810年-823年)、天历(947年-956年)间,宫廷贵族尤重汉诗文,可谓“帝业与文学偕盛”。延久(1069年)之后,进入战国时期,战乱频繁,汉诗文仅限于山林寺院。而至江户时代,社会太平,文教昌盛,汉诗文创作“玉烛继光,金瓯无亏”,生机盎然,甚至让日本汉诗人有了“无让汉土”空前自信。

日本汉诗随中土诗歌的传入而兴起仿效写作,但其对中国诗也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根据本国朝政及历史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吸收、继承和创造。江村北海曾言“气运推移有本末、有迟速”(清水茂等 509),虽然日本汉诗的源泉在中国,但是真正促使日本汉诗发展变化是本国的“世道”。世道兴衰形成日本历朝的发展脉络,而世道的变革也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日本汉诗的盛衰。江村北海通过对日本世道盛衰与汉诗创作消长之间的

关系辨析,证实了日本汉诗的发展摆脱不了本国世道兴衰的制约关系。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江村北海在胡应麟“气运”说的基础上,分析日本汉诗滞后中国诗歌发展的原因,首次指出日本汉诗滞后中国诗歌发展“二百年”的时间差。“二百年”是日本汉诗消化吸收中国诗歌,并逐步走向汉诗本土化的时间,这一时间差在很大程度上也促成了日本汉诗发展不同于中土的“气运”。北海意识到汉诗盛衰受制于“世道污隆”,日本汉诗发展与本国的世道变迁密切相关。其对日本汉诗发展的观察视角,不再局限于追随中国诗歌的轨迹,更立足于本国世道,从而认定本国世道变迁是促使日本汉诗发展的根本原因,世道变迁又促使着日本汉诗更为自觉地吸收和改造中国汉诗传统,日本江户诗坛最终也就形成了有别于中土的诗风变迁。江村北海此论,指出了制约日本汉诗发展的根本因素,具有重大的东亚汉诗学意义。

四、《诗薮》诗歌审美标准对 《日本诗史》的影响

胡氏曾言“汉、唐以后谈诗者,吾于宋严羽卿得一悟字,于明李献吉得一法字,皆千古词场大关键,第二者不可偏废。法而不悟,如小僧缚律;悟不由法,外道野狐耳”(胡应麟100)。他认为作诗既有法又要有悟,二者不可偏废。具体而言,“作诗大要不过二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体格声调有则可循,兴象风神无方可执。[……]故法所当先,而悟不容强也’(胡应麟100)。法即诗之体格声调,悟为诗之兴象风神,体格声调是作诗的基础,而兴象风神则是产生诗意关键。“体格声调、兴象风神”二者兼备,是胡应麟心目中的诗作理想,也成为他的诗歌审美标准。

《日本诗史》也将格律声调作为汉诗审美的首要标准,如论太宰大貳男的送别诗古朴,“体格未臭”(清水茂等480)。村上冬岭之诗“精深工整,超出前辈,元和以后,七言律到此始得其体”(清水茂等494)。宇野明霞“其诗纪律精详,一字不苟。[……]其诗亦得之苦思力索,是以规度合而变化不足,声调匀而神气离”(清水茂等500)。平野金华诗“有太佳者,有太不佳者。太佳者体格雄华,金石铿锵;太不佳者浅陋支离,剽窃陈腐,

如出二手,亦唯负才,不能精思耳”(清水茂等510)。

对时人诗作中过于雕琢词语的弊病,胡应麟与江村北海皆多有批评。胡氏曾言“昔人谓石之有眼为研之一病,余亦谓句中有眼为诗之一病”(91)。“句中之眼”指的是刻意追求炼字琢句,往往成为诗人的通病。同样,江村北海对当时日本汉诗创作中好用奇字怪词的现象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评,称之为恶俗。“古昔朝绅咏言,非无佳句警联,然疵病杂陈,全篇佳者甚稀,偶有佳作,亦唯我邦之诗耳,较之于华人之诗,殊隔径蹊。虽近时诸名家,以余观之,亦唯我邦之诗,往往难免习俗”(清水茂等487)。自奈良、平安时代始,日本汉诗人就喜爱并模仿六朝唐代诗风,追求炼字炼句,至江户前期诗坛此类弊病依然普遍存在。江村北海针砭不少日本汉诗人追求奇字奇句,刻意模仿唐风因而沉痾难除的弊病,如评大井守静“集中数用奇字僻语”,认为其“殊远风雅”(清水茂等499)。小野篁《陇头秋月明》一诗“骨气韵格,直逼盛唐,而造语间失疏卤,可惜”(清水茂等482)。参议有国七言长篇《重阳陪宴》“用事错综,足见才思,但章法句法未透,难入选耳”(清水茂等475)等。

胡应麟论诗古体推汉,近体标唐,近体诗人中对杜甫律诗尤为推崇“古今专门大家,吾得三人:陈思之古,拾遗之律,翰林之绝。皆天授,非人力也”(35)。“杜五言律,自开元独步至今”(73)。“七言律,唐以老杜为主”(83)。“老杜七言律[……]自是千秋鼻祖。异时微之、昌黎,并极推尊,而莫能追步”(93)。宋以后学杜者众多,但“学杜者什九失之,不知变主格,化主境,格易见,境难窥”(90)。宋人学杜反易陷入事障、理障,“余戏谓宋人诗,病正坐此。苏、黄好用事,而为事使,事障也;程、邵好谈理,而为理缚,理障也”(39)。胡应麟对宋诗人擅长的用事与主理非常不满,这一诗学倾向也影响到了江村北海评价日本汉诗。

日本五山汉诗主学宋,五山汉诗人中的绝海中津与义堂周信并称于世,被誉为“五山文学双璧”。江村北海这样评论这两位杰出的五山汉诗人:“读《蕉坚稿》,又读《空华集》,审二禅壁垒。论学殖,则义堂似胜绝海;如诗才,则义堂非绝海敌也。绝海诗,非但古昔中世无敌手也,虽近时诸

名家,恐弃甲宵遁。[……]有工绝者,有秀朗者,优柔静远、瑰奇瞻丽,靡所不有。义堂视绝海,骨力有加而才藻不及,且多禅语又涉议论。温雅流丽者,集中无几”(清水茂等487)。北海所言义堂诗作“参禅论道,且好议论”,皆是宋诗影响五山汉诗的明显痕迹。其在编撰《日本诗史》过程中选择五山汉诗时,更明确树立“辞艰意滞,涉议论,杂诙谐者,与藉诗以说禅演法者,皆余所不采也”的选诗标准(清水茂等486)。北海对五山汉诗“辞艰意滞,涉议论,杂诙谐”的不满,正是胡应麟所痛批的“事障、理障”。可见,在汉诗审美标准方面,江村北海与胡应麟都讲究体格声调,追求诗作声调的圆融浑然,其审美倾向是基本一致的。

此外,江村北海《日本诗史》在注重格律声调的同时,喜用“气骨”一词品评诗作。如评小野篁《陇头秋月明》一诗“骨气韵格,直逼盛唐”(清水茂等483)。笠原云溪“其诗妩媚足自喜,而气骨纤弱”(清水茂等496)。室鸠巢“五言排律,学力与才气相驾,豪健腾踔,最为当行”(清水茂等502)。服部苏门其诗“欠精细工夫,气格并合”(清水茂等501)等。对“气骨”的重视,显示出北海对评诗标准兼备“体格声调、兴象风神”的正确理解,用于评述日本汉诗人,往往一针见血,一语中的。

明复古诗派倡导“既学古人,遵古法,又有所创新,而不流于剽窃雷同”(廖可斌314)。但实际创作中却往往拘泥古法,缺少真情实感,未流更是陷入剽窃雷同流弊。胡应麟论诗提出兴象风神,欲以纠正复古派诗作之弊。江村北海在继承《诗薮》“体格声调、兴象风神”的基础上,论诗既重视体格声调,又倡导气骨,并兼顾日本汉诗创作特色,在兼容本国“哀”的审美风格基础上,提出以“风雅”论汉诗。北海所言“风雅”已带有日本诗学特色,其具体内涵可概括为以下两点:

(一)“风雅”偏重温柔敦厚。江村北海在日本历代汉诗人中推崇四人:绝海中津、新井白石、梁田蛭岩、祇园南海。“余按我邦诗,元和以前,唯有僧绝海。元和以后,渐有其人,而白石、蛭岩、南海其选也”(清水茂等509)。绝海中津的汉诗,用事贴切自然,风格变化,形态万千,江村北海认为这种具有“唐人那种风韵流转的诗歌才是佳品”(谭雯173)。新井白石诗才非凡,“可谓锦心绣肠,咳唾成珠”(清水茂等502),从其汉诗全集

来看,多清雅秀婉之诗,“悲壮沉郁、浑雄苍老者,集中无几”(清水茂等510)。祇园南海之诗“词采富丽,盖少时作,晚岁渐刷铅华,而神气融合,殊可传者”(清水茂等503)。但总体看来其汉诗“一味绮丽,后勤超脱”(清水茂等510),过于纤巧。梁田蛭岩则诗风屡变,“为唐、为宋、为元、为初明、为七子、为徐文长、为袁中郎、为钟谭”(清水茂等507)。其作诗勤于锻炼,八十岁时依然“孜孜兀兀潜思字句,宜能造诣精微”(清水茂等507)。北海赞其诗曰“今读其集,譬犹上昆仑之邱,步步是玉;入梅檀之林,枝枝是香”(清水茂等507)。但又惜其用才太过,不免“有伤风雅”(清水茂等510)。“有伤风雅”即指梁田蛭岩的诗作缺少温柔敦厚之旨。相对于其他杰出诗人,服部南郭虽“天授不及白石,工警不及蛭岩,富丽不及南海”(清水茂等509),但其汉诗成就却不在这三人之下。北海认为其原因就在于服部南郭“能守地步,不求胜于一句一章,而全功于一卷一集”(清水茂等510)。南郭诗虽大多为文辞拟古之作,但却写得中规中矩,体现出了温柔敦厚之旨,因而备受诗坛推崇。

(二)“风雅”也指风流雅致。据日本国语辞书《大言海》,风雅意为“啸风望月风流”。日本俳圣松尾芭蕉在《笈小文》中强调“风雅乃意味歌之道”。所谓“风雅”是指“日本人的美意识中自然感之美、人物之风情”(叶渭渠,“日本”158),它是在本国传统美学理念“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哀”在日本最早的文献著作《古事记》、《日本书纪》中即有记载,表示悲哀感情的直接喷发,带有同情、怜悯之意。后被《万叶集》继承发展,“哀”指的是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爱怜的咏叹和悼念的哀愁”(叶渭渠,“日本”94)。至平安时代时,“哀”的审美内涵“从情绪性推移到情趣性的感动”(叶渭渠,“日本”95),“凡高兴、有趣、愉快、可笑等这一切都可以称为‘哀’”(叶渭渠,“东方”213)。镰仓、室町时代时,“哀”又融合勇壮之意(叶渭渠,“日本”92)。至江户中前时期,“哀”这一审美思想继续发展,指的是心灵对“物”引起感动而产生的喜怒哀乐诸相”(叶渭渠,“日本”102)情致的体味,这种体味无对错之分,“含赞赏、亲爱、共鸣、同情、可怜、悲伤”(叶渭渠,“日本”98)等广泛含义。

江村北海将“哀”美学理念融入了传统的风

雅论中。以之论诗,既注重风雅内容上的深郁厚笃,又突出了风雅在艺术手法方面表现出的委婉细腻之美。如评藤原惺窝《长啸子灵山亭看花戏赋》诗“一时游戏之言,体格亡论已;然意致曲折,足证温籍”(清水茂等 510)。惺窝此诗韵脚五用“花”字,四用“君”字,虽为戏作,但却意致曲折,有风雅之致。石川丈山“当时诸儒咏言,率出于性理之绪余,乏温柔旨;而丈山梦寐山林,襟怀潇洒,如‘窗间残月影,枕上远钟声’、‘风柳起莺懒,山花留马蹄’、‘半壁残灯影,孤床落叶声’等,意象闲雅,殊可讽咏”(清水茂等 510)。还有评伊藤仁斋“概其为人,宜不屑声律也。而诗间有有旨趣者,殊可嘉称”(清水茂等 491)等。

以上两点内涵构成了江村北海的“风雅”诗论,其标举风雅,不仅是对日本复古派诗论的补救,而且还包含着对日本汉诗发展史基本规律的总结。

结 论

《诗薮》是胡应麟诗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其一方面对前后七子复古诗歌理论进行了总结,另一方面在格调声律之外力倡兴象风神,体现了由“格调”说到“神韵”说的嬗变,在明清诗学理论体系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日本诗史》是首部系统论述日本汉诗史的著作。江村北海对日本历代汉诗发展作了扼要阐述,促进了日本汉诗学的本土化。其提出的日本汉诗发展滞后中国“二百年”的说法,视野广阔,分析透彻,对日本汉诗界产生了极大影响。《诗薮》与《日本诗史》在中日诗歌发展史上都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枢纽地位。尤其是北海的《日本诗史》首次以“诗史”命名,“系东方诗歌专门史最早立于世界文坛的集成之作”(谭雯 246),所以堪称日本汉诗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日本诗史》也注意到避免《诗薮》论诗的不当之处。比如胡应麟自称以“无偏听,无成心,公而生明,则自尽心始”(胡应麟 序 2)的原则撰写《诗薮》,但由于私交甚好,胡应麟对王世贞的评价时有过誉之处。如“元美诸作,不袭陈言,独絜心印,皆可超越唐人,追踪两汉,未可以时代论”(40)。显然对其评价有虚美拔高之处。这些不实评价,也引起后来尊王尊李派之间的长期争议,

甚至影响到日本汉诗人对胡应麟的不同评价。如芥川丹丘在《丹丘诗话》中批评胡应麟“颇阿其所好,与夺过实”(池田四郎次郎 619)。也许正是看到这一点,江村北海在撰写《日本诗史》时坚持“近时作者必盖棺论定而后敢论”(清水茂等 471)知人论世,全面评价,避免因一己私见而引起后人非议。北海汉诗评论中秉持中立态度,因为他充分认识到“古曰作诗之难,论诗更难,非论之难论,论而得中正之难”(清水茂等 471)。比如对江户古文辞派领袖荻生徂徕的评价,既没有过于褒扬也没有刻意贬低,而是如实指出“徂徕才大气豪,言多过激,故其行也骤,而其弊亦速”(清水茂等 509)。相对于胡应麟《诗薮》中的颇多评论偏差,江村北海的“以诗论人”显得要公允得多。

综上所述,《日本诗史》在形式上将《诗薮》以诗话系统记载诗歌史的形式,与史撰国别体、纪传体相结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以“地域划分为主”、“按身份地位分类叙述”的叙事汉诗史结构。在内容上,继承和发展了胡氏“气运”说,不仅对日本汉诗追根溯源,而且提出了“世道”说,将汉诗本土化过程与日本政治以及时代风气变化相联系。江村北海认为“气运”与“世道”密切相关,“气运”转换是日本汉诗发展的根本推力,而“世道”则是日本汉诗发展的根本基础。也正因如此,日本汉诗才有了与中国诗歌的不同特色,也使中日两国在汉诗审美方面产生了差异。北海的“气运”、“世道”说立足于对日本汉诗发展衍变的探索,初步阐述了汉诗本土化与日本社会发展及时代风气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北海不仅首次阐述了日本汉诗的整体发展历程,而且还深入探讨了日本汉诗形成本国特色的内在原因,这在日本汉诗乃至东亚汉诗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注释 [Notes]

① 数字统计依据清水茂、揖斐高、大谷雅夫校注《日本诗史·五山堂诗话》,《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东京:岩波书店,1991年)。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蔡毅《日本汉诗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Cai, Yi. *On Chinese Poetry in Jap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7.]

顾嗣立编《元诗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Gu, Sili, ed. *An Anthology of the Yuan Dynasty's Poet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7.]

胡应麟《诗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

[Hu, Yinglin. *Shi Sou (An Anthology of Poetry)*.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58.]

池田四郎次郎编《日本诗话丛书》。东京:株式会社风出版社,1972年。

[Ikeda, Shirojiro, ed. *Collected Poetry Remark of Japan*. Tokyo: Kabuskiki Kaisha Phoenix Press, 1972.]

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上),叶渭渠唐月梅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

[Kato, Shunichi. *An Introductory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Vol. 1. Trans. Ye Weiqu and Tang Yuemei.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1.]

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Liao, Kebin. *A Study of Ancient-Style Revival Movement in the Ming Dynast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8.]

刘芳亮《日本江户汉诗对明代诗歌的接受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

[Liu, Fangliang. *A Study on the Reception of the Ming-Dynasty Poetry in Japanese Edo Era*.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刘勰《文心雕龙》。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Liu, Xi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清水茂等校注《日本诗史·五山堂诗话》,《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5。东京:岩波书店,1991年。

[Shimizu, Shigeru, et al. *A History of Japanese Poetry: Poetry Remarks from Five-Mountain Hall. New Collections of Classical Japanese Literature*. Vol. 65. Tokyo: Iwanami Shoten, 1991.]

孙立《日本诗话中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Sun, Li. *A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ics in Japanese Poetry Remark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谭雯《日本诗话的中国情结》。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Tan, Wen. *Chinese Sentiments in Japanese Poetry Remarks*. Beijing: Social Science Press, 2007.]

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Ye, Weiqu. *A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ry Thought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东方美的现代探索者——川端康成评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 *A Modern Explorer of the Oriental Beauty: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Kawabata Yasunari*. Beijing: Chinese Social Science Press, 1989.]

(责任编辑:程华平)